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陈晓露：寻找失落的楼兰



什么是楼兰

20世纪初,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在罗布泊探险时,偶然发现了文献记载中的楼兰古城,消息传回欧洲,引起轰动。这片荒漠从此成为世界探险家和考古学家关注的焦点。

楼兰,到底是什么?它本是汉代的一个西域小国,名字最早见于公元前176年匈奴冒顿单于写给汉文帝的信:“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或当为三)十六国。”执笔的是单于帐中的译官,把西域国名从本地语言转译为汉语。没想到,“楼兰”二字在汉语里竟成了绝妙的组合——双声联绵,音律优美;“楼”是巍峨建筑,“兰”是蕙质兰心,陈晓露觉得这两个字组合起来,“弥漫着一股浪漫、优雅梦幻般气息”。

或许因其名字优美,或许因其故事传奇,从唐代起,“楼兰”便成为诗人笔下西域的代称,“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这些诗句将楼兰深植于华夏民族的记忆之中,承载着开疆拓土、建功立业的豪情。

然而,北朝以后,楼兰逐渐变成一个“消失的古国”。人们知道它是丝绸之路的枢纽,发生过刺杀与封侯的壮烈往事;知道它汇聚东西方文明,在汉匈两大帝国之间摇摆。但它的具体位置、物产状况、风土人情,无人能说清。

斯文·赫定的无意闯入,开启了楼兰考古的百年进程。各国探险家、考古学家纷至沓来,带走大量文物。1930年,考古学家黄文弼在罗布泊发现土垠遗址,1948年出版《罗布泊考古记》,这是中国人首次在楼兰研究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者主导的考古工作在新疆系统开展起来,先后对尼雅、米兰、且末扎滚鲁克等遗址进行发掘,取得多项突破性进展。这些地点虽不在楼兰核心区,但均属大漠楼兰考古范畴,从不同层面深化了对楼兰历史的认识。

然而,罗布泊自然条件恶劣,“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切工作都从零开始,后勤保障难以跟上。”1962年,罗布泊被划为核试验区,考古工作基本停滞。

1979年,罗布泊考古工作重启。中日联合拍摄纪录片,考古工作队进入楼兰遗址,穆舜英、王炳华、王明哲等学者参与其中,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中国考古界的重要人物。此后,因国家对遗址的政策是以保护为主,学者们多是在现有发掘基础上推进研究,将楼兰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有一次,陈晓露和几位历史爱好者同去考察北魏六镇中的一处汉代长城遗址,抵达现场后,看到的却只有微微隆起的长城墙基。陈晓露解释:“我们发掘的往往都是废墟。原本也许高逾十几米的墙体,如今很多都只剩下几十厘米。”爱好者们轻声叹息着,难掩心中的失望:“原来这就是长城。”中国的土遗址,失去讲解,很难看出门道。

“遗址本身不会说话。”此后,每到博物馆或遗址,碰到不懂的游客,陈晓露便忍不住冲上前解释一番。再后来,她便写了这本《失落之城:楼兰四千年》。

长期以来,公众对楼兰存在两种误解:一是过度浪漫化,将其简化为一个“神秘失踪谜题”;二是认知扁平化,忽视其跨越四千年的时空周期。楼兰不仅是一个夹缝求生的小国,更是中原与匈奴、贵霜、粟特等诸多族群交织的枢纽。学者普遍认为,楼兰曾经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世界的中心存在过,西来的文化在此演化、迭代,再传入中原,深刻影响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文明体系,也在不断演进与发展”。

作为当今中国楼兰研究最具代表性的学者,陈晓露说,我们今天了解楼兰,不是为了记住一段遥远的往事,而是因为“认识我们如何走到今天,是人的本能”。

误入“心流”

2001年,陈晓露考入北京大学,被调剂到了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在那个年代是冷门中

的冷门。每年都有转系名额,她报了名,“但没轮上。”

大三去陕西西周原遗址实习。8月进村,第二年1月才回,整整一学期吃住都在村里。家人朋友听说了都为她叫苦,她倒觉得挺好。

“去之前只知道考古要挖,但怎么挖、挖哪儿,完全想象不出来。”带队老师带着他们走了一遍流程:先考察地形地貌,在地表上采集陶片等遗物,根据陶片大致判断是否存在遗址,遗迹及其年代、性质,再结合自然剖面等信息综合判断后,选择合适的地点进行发掘。开挖后,陈晓露的发掘区出了一个巨大的灰坑,里面有不少青铜冶炼的渣渣,需要画图记录。渣渣外观不成形,有的还比较碎,无从下手,学校里也没教过怎么画这类文物。她小时候学过点画画,就拿起笔琢磨着画了出来。老师一看挺满意,她就成了工地的绘图师。

但真正让陈晓露决定留下的,并不是画画。

亲手开挖之后,陈晓露真正体会到了考古的科学性:“它确实有着严密的逻辑。”史书就像罗生门,同一件事,不同的人可以讲出不同的版本。但考古却可以客观描述——一张桌子长多少、宽多少,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那个数。

再比如清理人骨。人体的软组织腐朽得很快,大多数时候只剩下一些骨渣,还容易跟泥土混成一片。这时候就需要用小刷子或筷子,一点一点往外剔,“这个过程非常解压。”她用了个流行词“心流”描述那种状态,“当时真的感受到了多巴胺分泌带来的愉悦和舒适,觉得这个状态非常适合自己。”

唐诗里的楼兰写得再豪迈,真实的考古工作没那么浪漫。冬天实习,天寒地冻,西北风刮在脸上跟刀子似的。老师表扬她投入工作:“一个女生,早上起来不洗脸就去整理资料了。”她哭笑不得:“这是在夸我吗?”

后来去沙漠腹地的小河遗址调查,二十来天,沙漠里一滴水都没有。所有水都要靠人带进去,大家省着用,省到最后工作结束时发现还剩下不少。只好全放掉了。出来的时候,领队拍着她肩膀说:“小陈,挺能吃苦啊。”

实习结束,她选修了林梅村教授的丝绸之路考古课。课堂上讲到西域,小时候背过的诗全涌了上来。一个被文学浪漫化、被探险家“发现”的失落王国,真实面目到底是什么样的?她被这个问题吸引了。

林老师给她出了个题目:整理楼兰的一处佛寺遗址。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画过这座佛塔,但没人专门讨论过。她查阅了大量资料,写出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读研究生后,老师建议她把题目扩展到整个楼兰。楼兰考古,就这么成了她的博士论文选题。

说起林梅村教授,在北大考古文博学院,他可是个传奇人物。

他本是考古出身,同时还是一位语言学家。父亲是翻译家,通晓十六门语言。受家学熏陶,林老师对语言天然地着迷。研究新疆考古时,他发现楼兰出土了大量中亚语文字的书(注:死文字是指古代使用过,但现代已失去实际应用功能的书面文字系统),就自己把这些死文字啃了下来。而丝绸之路上的通商和佛教语言文字——佉卢文(后随着贵霜帝国的灭亡而成为一种死文字),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可能只有他一个人通晓。

“我们选他做导师,本都想学他的‘绝活’。”陈晓露说,但“最终谁也没学出来。”虽然没有学会导师的“绝活”,但在后来的研究中,因为一次偶然的发现,陈晓露与佉卢文产生了交集。

那是在楼兰一座壁画墓的清理现场。墓被盗过,壁画画得精美,但被人为铲去了许多,尤其是人物头部以上的部分。学者们对墓主人的身份争论不休,有人说是中原戍边将士,有人说是粟特人,陈晓露则倾向于认为是从中亚移民至此的贵霜人。直到她师兄去现场考察,在被铲过的壁画上,发现了一处佉卢文题记,恰好支持了她关于墓主人是中亚移民的观点。

在已经清理过的考古遗存上,又有自己的发现,陈晓露说,“这种时刻,还挺惊喜的。”

找了一座又一座

楼兰的都城究竟在哪里?这个问题困扰了学术界一百多年。

西汉与匈奴争夺西域,楼兰身处夹缝。小国不敢得罪任何一方,只好向两边各派质子,左右摇摆。在长安为质的楼兰王子尉屠耆向汉昭帝报告:在位的哥哥偏袒匈奴,屡次杀害汉使。汉廷大怒,派刺客傅介子前往楼兰。手起刀落,楼兰王人被送回长安,悬首示众。尉屠耆被扶立为新王,史称“斩楼兰”事件,一个亲汉政权自此建立。

斯文·赫定发现楼兰古城后,因出土文书中有“楼兰”字样,便认定这就是楼兰的发生地。他将其编号为LA—L是“楼”的拼音首字母,A代表第一座,最重要的古城。

后来考古发现显示,LA古城的地表遗存大多属于魏晋时期,比斩楼兰事件晚了数百年,最早也只能到东汉。王国维早年就认为LA应为“海头”,而非楼兰都城。也有学者如王炳华坚信LA就是楼兰,认为只发现魏晋遗存是由于尚未深入发掘。

林梅村则提出,LA古城东北约30公里处有一座被当地人称为“方城”的LE古城,其筑城技术属于西汉时期,那才是真正的楼兰城。陈晓露最初认同导师的观点,但随着研究深入,她发现了问题。

方城平面呈方形,城墙是典型的汉代夯

土板筑——两侧夹板,中间填黄土,层层夯实。这种技术在中原自新石器时代沿用至汉,在内蒙古汉代长城一带比比皆是。年代没错,是西汉。但楼兰城在汉朝使者第一次到达时就已经存在,那应该是一座本地人修建的城,而非汉人所筑。

西域筑城方式截然不同:干旱少雨,人们用淤泥堆积,随形就势,城址常呈圆形。当地人没有中原“崇方”的理念,圆形还能防御风沙,所以方城是汉式的,不是楼兰式的。“它应该是一个汉人筑的城,相当于汉代都尉一级军官的治所,”陈晓露说,“而不是楼兰人自己的城。”

那么,楼兰人自己的城在哪里?陈晓露在多年寻访中屡屡受挫,却始终未放弃。她感慨:“找了一座又一座,都不是。”

2017年,考古人员在罗布泊西北发现了咸水泉古城。城墙用淤泥堆积,平面呈圆形,符合西域本地传统。陈晓露认为,这很可能就是楼兰王城的真正所在。

她还推断,尉屠耆从长安返回后新建的都城,是若羌的且尔乞都克古城;而旁边的米兰古城,便是汉朝屯兵的伊循城。米兰古城呈方形,夯土板筑,是典型的汉式城墙。但米兰古城面临与LA相似的问题:地表遗存多为五世纪以后,甚至八九世纪的文物,属于吐蕃和唐代。缺乏汉代遗物,成为认定其为伊循城的最大障碍。

2014年,陈晓露在罗布泊调查时,一位文物保护巡查员递给她一件偶然在地上捡到的文物,一只“格里芬”纹金属斧。这是一把典型的北方游牧人群使用的铜斧,可溯至战国至西汉时期。它出现在米兰古城,证明该地在汉代已存在且被使用。

“我看到它的瞬间,非常惊喜。”陈晓露说。

这件被风“吹出来”的文物,后来成为支持米兰古城为伊循城的关键证据之一。

寻根是人类的本能

“楼兰的故事,并不是一个人定胜天的故事。”陈晓露说。

罗布泊偏僻、干旱、荒凉。资源匮乏,生态脆弱,维系一方水土已是极限。魏晋时期,一位在此戍边的中原屯田将士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绝域之地,遐旷,险无崖!”一千多年后,这片残纸被考古者从风沙中掘出,在极端干旱的环境下,墨迹仍保存如新。

人的生命力,比纸更顽强。尼雅遗址出土的东汉蜡染棉布残片,是国内已知年代最早的棉布之一,棉布上面带微笑的“提喀女神”手持



尼雅遗址出土的东汉蜡染棉布残片

的木雕与骨雕人面像,至今面目可辨,依稀可见千年前的笔触。陈晓露说,那些“活出了各自精彩”的人,就活在每一件出土的文物里,也活在每一句跨越千年的诗句中。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失落”是楼兰注定的宿命。

孔雀河断流,罗布泊干涸,曾经滋养城市与人群的绿洲,一步步沦为死地。咸水泉、小河西北、营盘等遗址无一例外,都已退化为远离现代城镇的郊野废墟。在陈晓露看来,楼兰的历史,是人类与极端环境共生、文明在夹缝中绽放又凋零的缩影。

2023年,陈晓露的视野从罗布泊延伸到了乌兹别克斯坦。她作为中方领队参与中乌联合考古项目,发掘的阿卡察可汗·卡拉遗址与楼兰属于同一时期。同样是绿洲,同样是河流尾间,同样是丝绸之路上的城址。“我想了解绿洲上的人群如何生活,了解他们的生存状态和适应策略。”

从新疆到中亚,她的问题一以贯之:面对有限的资源和极端的环境,绿洲人群发展出了怎样的生存策略?为什么他们的社会结构与草原帝国或中原王朝截然不同?她认为,绿洲经济可以从事农耕,但承载力有限,不可能诞生大型政权。绿洲人群相对分散,统一难以持久。

丝绸之路最关键的不是两端,而是中间那一串点——它们连成网状结构,而不是金字塔。

从接触楼兰至今,近二十年过去了,考古也从冷门变成显学。刚上大学时,在火车上别人听说她学考古,反应多是“这个专业很冷门”,接着问“秦始皇陵什么时候挖”。再后来,盗墓案日多了,人们开始问某件文物有什么历史。如今,人们会问到三星堆发掘的细节,几乎没人再跟她说“你们不就是合法的盗墓”。

但楼兰的秘密还有很多。都城未定,人群来源成谜,小河文化之后的那段空白仍埋在大漠深处。“我们期待后续有新材料来改变认识,这是一个没有完结的事情。”陈晓露说。也许它永远无法完结。

“但这个认识的过程,便是我们寻找自身根源的过程。”她说,“对自身根源的寻找,是人类的本能。”

陈晓露不急着。她还是蹲在遗址上,用刷子一点一点地剔着泥土,把一块块枯骨从历史里捞出来。

面孔



马未都：从姥姥家到奶奶家

近日,文化学者、观复博物馆创办人马未都的山东寻根之旅系列短视频,在其自媒体账号更新完毕。他的此次“山东行”不仅以美食和人文景点串联起齐鲁大地的风土人情,更以孝思和家国情怀,传递中华美德。

马未都此次山东行从其姥姥、姥爷的故乡东营利津出发,途经寿光、莱州、蓬莱、烟台、威海等地,最终抵达其父亲的家乡荣成威海,完成了“从姥姥姥爷家到爷爷奶奶家”的心愿。

在山东行中,马未都深入体验了沿途美食。寿光蔬果、朝天锅、鲜美羊汤、全鱼宴、虾蟹配大馍、鲅鱼水饺等,既让他回味了童年的味道,也激发了网友的兴趣,山东美食的烟火气透过屏幕感染了无数人。

马未都还到人文景点展开深度“打卡”。他探访了东营黄河入海口、寿光蔬菜大棚发祥地、蓬莱阁、烟台所城里、北极星钟表文化博物馆、刘公岛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荣成海草房及灯塔等地,以“个人寻根”为主线,串联起山东的风物、历史与人文。

马未都说,他此次“烟花三月下山东”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践行曾子所说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既是为了祭奠先人、替父母圆梦,也是为了传承家族记忆与中华美德。他的父亲18岁时投身革命,参加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九死一生活了下来,而正是有无数像父亲一样的先辈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吕凯：发现琅琊台

近日,备受瞩目的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结果公布,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成功入选。琅琊台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战国秦汉研究室主任吕凯率领联合考古队在琅琊台遗址足足耕耘了七年。琅琊台遗址的考古发掘得到学界和公众的认可,在吕凯看来,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2019年以来,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共同对遗址进行了持续的主动性发掘。“发掘过程中,大家逐渐感觉到当年这个工程很宏大。”吕凯说,每一位考古工作人员都有种穿越回秦代的感受。他们试图弄清和还原这里发生的“秦朝往事”——琅琊台遗址的真实面貌。

最终,考古工作证实,位于遗址中心山顶的“大台”主体,被确认为“秦修汉葺”的高台建筑基址,其宏大的规模和高等级遗物,与先前发现的秦代刻石相互印证,共同指向了《水经注》《史记·秦始皇本纪》等文献中记载的秦始皇所筑琅琊台。遗址还包含同时期建造的方形院落、烧造建材的砖瓦窑址、形制独特的战国时期建筑等。琅琊台遗址的规模、布局及主要遗迹面貌逐渐显露。

吕凯称,琅琊台作为秦汉王朝威权在东方的重要象征,见证了古代国家对海疆的治理与开发,也承载了先民对海洋的探索与向往。“琅琊台正是矗立在大海之畔,展现秦汉时期开拓进取的时代特征的一座丰碑。”



黄石：记录照顾父亲的最后时光

作家黄石最新出版的非虚构作品《花园与父亲》,因书写一个普通儿子照顾父亲的真实样本而受到关注。这本书记录的是一个关于疾病、死亡与代际和解的故事。

黄石一家搬入新居,生活正要步入安稳时,父亲被确诊为前列腺癌。黄石和父亲合力把门前的草坪改造为一个带水池的花园。五年时光,父亲在一次次化疗中与病痛抗争,家里的花园却在悄然生长和迎来源成。夏日的花园又绿又亮,父亲却在医院里平静离世。

这一过程中,儿子也在与典型的传统父亲的长期对峙中占据主动,却也因此而倍感迷茫。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否都正确呢?真的是用尽全力了吗?为何没有带父亲去上海大医院看病呢?黄石那些无人可说的煎熬、怜悯、愤怒、恐惧与无助,照见了无数人面对至亲离去时的共同心境。

黄石说,《花园与父亲》对社会转型期的家庭伦理关系的变迁作了一些呈现,“一个接受了一些现代思想熏陶的人,当他实实在在地应对父亲疾病,准备父亲后事的时候,内心会有怎样的一种气象?这种复杂性不仅蕴含在特定的我和父亲的关系中,更分布在周围普遍的父子关系中。”(□记者 师文静 整理)



楼兰古城中心街遗址